

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基础与机制

——兼论修辞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邱莹 施春宏

提要 本文基于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来探讨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基础与机制。文章首先使用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分析了修辞构式“一量名”中构件“量”和“名”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阐释了该修辞构式的生成基础。接着,基于构体对构件的“招聘”和构件向构体“求职”的双向合力互动视角,解析了构式的生成过程,进而概括了两个子构式“一量_{错位}名”和“一量_{移用}名”的不同生成机制。文章最后延伸讨论了修辞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

关键词 修辞构式;语法构式;一量名;物性结构;生成机制;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 非常规组合“一量名”的构式性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中对事物多少进行计数和计量的常规结构形式为“数词+量词+名词”(下文简作“数量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数词+个体量词+名词”,如“一张画、三本书、几所学校”。这是一种具有汉语类型特征的语法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在常规“数量名”结构中,尤其是含有个体量词的结构中,量词和名词之间存在着规约性关系。然而在实际使用情况中,存在着大量偏离规约性搭配的“数量名”结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推导性,其语义语用特征呈现出某种特异性。例如:

- (1)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鲜红娇艳,一朵花,一朵青春,每朵花都是展开眉眼,用笑脸迎着春天。(杨朔《三千里江山》)
- (2)a. 嫩蓝的春天,几支木杆,几痕细线连于杆与杆间,线上停着几个粗而有致的小黑点,那便是燕子。(郑振铎《海燕》)
- b. 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旋成一个深坑,或是一滚黄沙,淤平村里最高的屋顶。(孙犁《风云初记》)
- c. 不一会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一圆黑洞……(麦家《暗算》)

作者简介:邱莹,女,江西余干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和语言应用。电邮:qiuyingbleu@163.com。施春宏,男,安徽青阳人,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电邮:shichunhongbleu@163.com。

*本项研究得到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9YJ1400070)、北京语言大学重大专项项目(18ZDJ04)和北京语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的支持。《语言教学与研究》审稿专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在这些修辞色彩浓厚的“数量名”表达中,都包含特殊的非常规量名搭配形式。例(1)中量词“朵”常用于修饰“花”等,如“十朵花”,但此处却与名词“青春”组合搭配,属于名、量之间的错位(mismatch)搭配。例(2)各例中进入量词槽位的词分别借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作为临时量词与名词形成非常规搭配。例(2a)“细线”本应与“根”“束”等量词组合,但却移用名词“痕”(物体留下的印儿)来修饰,旨在凸显远处细线的模糊朦胧、似有似无;例(2b)“黄沙”本该用“片”“把”等量词修饰,为了凸显黄沙滚滚的动态性,该例使用表示行为动作的“滚”来修饰;例(2c)“黑洞”的常规搭配量词为“个”,此处借用形容词“圆”来修饰以凸显“黑洞”的形状。常规的、无标记的“数量名”结构形式(如“九朵花”“十根细线”“一片黄沙”“三个黑洞”)中的“量”和“名”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规约化的表达;而“一朵青春”“几痕细线”“一滚黄沙”“一圆黑洞”这些表达中的“量”和“名”则是非规约化的,具有语境依赖性。

根据刘大为(2010)对构式系统的区分,常规“数量名”结构属于语法构式,而以上诸例例示的“数量名”结构属于修辞构式(rhetoric construction)。若仅就例(1)(2)这些具体表达而言,它们似乎只能定位为语法构式“数量名”的特殊构例(construct),或曰修辞性构例^①,而不宜称为构式(construction)。^②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从这些实例抽象出来的结构式与语法构式“数量名”相比,在构件(construction component)和构体(construction body)^③特征上都存在着差异。就构件特征而言,作为修辞构式的“数量名”,其构件“数”局限于“一、半、千、万、几”等少数数词(例如“半掬微凉”“千靛春霞”“万顷愁”“几痕细线”等),非常受限,其中“一”占有绝对优势。而语法构式“数量名”的构件“数”不受限制,对数词具有开放性。基于此,为叙述方便,下文将这种修辞构式径称为“‘一量名’构式”。就构件关系而言,“量”“名”之间的搭配关系在语法构式中是规约性的,而在修辞构式中是临时建构的。就构式整体性意义而言,语法构式“数量名”表示数量的多少,而修辞构式“一量名”多用来描摹情状。由此可见,“一量名”虽依托于语法构式“数量名”,但已经结构化为一个具备新的形义匹配关系的构式,形成了具有图式性结构并呈现出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构式,即作为一个修辞构式而进入构式库中。该修辞构式还包含两个子构式:一类是例(1)中构例所例示的“一量名”构式,其中修饰甲类事物的量词被用来修饰乙类事物,量词是专用型量词或兼类量词,本文称之为错位型“一量名”修辞构式,形式化为“一量_{错位}名”;第二类是例(2)各例所例示的,其中进入“量”槽位的词是借用其他词类作为临时量词来修饰名词的,本文称之为移用型“一量名”修辞构式,形式化为“一量_{移用}名”构式^④。

关于“一量名”这类现象,学界既有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修辞效果和修辞动因的视

^①有关 construct,是指由抽象构式允准的具体实例(参见 Kay & Fillmore 1999)。有学者将 construct 译成“语式”(王寅 2011)。

^②目前很多研究修辞构式的文献,实际上没有很好地区分构式和构例之间的关系,以构例为构式。基于此,有学者就指出,修辞构式只不过是语法构式的“有标记或鲜活用法而已”,“似乎就没有必要给语法构式安置一个并列的‘修辞构式’”(侯国金 2016),从而否定了将“修辞构式”作为理论实体的地位。当然,这里面有误解,但究其原因,也与学界关于修辞构式研究的某些认识不够到位有关。

^③为了方便区分构式整体和构式组构成分及其特征,我们称前者为构体,后者为构件。构式包含构体和构件这两个层面的内容。相关概念的定性和区分参见施春宏(2018、2019)和施春宏、李聪(2018)等。

^④严格意义上来说,“一量_{移用}名”构式中,“量”槽位的成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量词,而是由于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的作用使这些临时借用自其他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实现为量词的功能。

角去讨论量词的变异使用(如王希杰 1990;冯广艺、张春泉 2002;雷淑娟 2005 等),这类研究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背景的超常搭配分析路径,将“一量名”的形成多归因于“量词”的转类,对其形成动因多有随文释义、就例释例、逐例而释之感,缺乏深层次理论和机制的说明。本文主要立足于互动构式语法的理念来对这类“超常搭配”现象做出新的认知分析。二是运用相关认知理论如意象图式理论、隐喻理论、转喻理论、原型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等对量名超常搭配的语义建构过程进行识解,阐释其形成的认知规律(如毛智慧 2008;高原 2009;王文斌、毛智慧 2009;毛智慧、王文斌 2012)。这类研究多从听话人的角度、从识解的角度来考察超常搭配形成的认知过程、认知机制等,而本文主要从说话人的角度、从生成的角度来探讨“一量名”形成的过程和机制。

基于互动构式语法(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研究路径及其精致还原主义(sophisticated reductionism)方法论原则(施春宏 2016、2018),我们从构式生成过程中构体和构件的基本特征及互动关系出发来分析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基础和结构化机制,并借此探讨修辞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

二 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基础

修辞构式“一量名”中的量词和名词之间有较强的语义理据,其生成路径和语义识解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性,即量名之间具有语义内容上的依存性和相互触发性。基于此,本文从名词出发,讨论名词的语义信息结构如何影响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本文所使用的名词语义知识描写体系是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中的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描写体系。

生成词库理论是 Pustejovsky 基于组合性原理创立的、通过词库属性的描写来有效识解词语搭配关系尤其是特殊组配形式的理论架构,并试图借此说明词义的动态性、多样性和创造性用法。该理论体系中,物性结构是最为核心的内容。Pustejovsky(1995)描写了组成物性结构的四种物性角色:构成角色、形式角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袁毓林(2013)根据汉语名词在真实文本中的搭配情况,对名词的语义网络做了更为精细化的分析,将物性角色扩展到了十种,包括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单位角色、评价角色、施成角色、材料角色、功用角色、行为角色、处置角色、定位角色。这样的物性角色体系能够更充分地描写丰富复杂的汉语词语组配关系。基于该物性结构描写体系,结合名词和量词的实际搭配使用情况,本文重点介绍适用于描写“数量名/一量名”构式的五种相关物性角色:

形式角色(formal):用以描写名词所指事物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外在属性特征,如形状、大小、颜色等。如“一滴水”“一汪水”“一股水流”中,“滴”(点滴状)、“汪”(深聚状)、“股”(长条状)等是“水”的形式角色;“一圆黑洞”中,“圆”是“黑洞”的形式角色。

构成角色(constitutive):用以描写名词所指事物的结构属性,主要包括名词内部结构组成成分、名词所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结构关系。如“一册书”中,“书”表示装订成册的著作,量词“册”就是其构成角色;“一襟旧衣”中“襟”是旧衣的构成角色。

容器角色(container):用以描写用来度量名词所指事物的器具。如“一桶/缸/碗/盆水”“一袋子欢喜”中量词是名词的容器角色。

行为角色(action):用以描写名词所指事物的惯常性动作。如“一届学生”(学生届期)、“一流小溪”(小溪流淌)中,“届”“流”分别是“学生”“小溪”的行为角色。

处置角色(handle):用以描写人对名词所指事物的惯常性动作、行为和影响等。如“一叠碗”中“叠”是“碗”的处置角色;“一插康乃馨”中“插”是“康乃馨”的处置角色。^⑤

在修辞构式“一量名”中,最具特异性表现的就是量词的创造性使用,而量词创造性使用的生成本质与名词的物性结构相关,这也是量名非常规搭配的生成基础。该修辞构式根据量名之间不同的物性关系形成了有限的语义类别特征。下面我们就基于扩展的物性结构描写体系来分析该修辞构式的生成基础。

依赖于具体语境,名词的语义体系中被凸显的物性角色会直接触发量词的创造性使用。量词和名词之间存在的这种语义依存关系,是修辞构例生成的语义基础。例如:

- (3)她勉强维持淑女风度,将垂肩的一瀑秀发往肩后一拢。(蓝靖雯《名媛历险》)
- (4)一躯斜卧于秋野之上的睡美人吗?/光洁丰盈而顺长/精灵跳动的蓝眸/在嘲笑谁?
(巴彦布《贝加尔湖梦幻》)
- (5)叶片像绿色的小舟,载着一船绿色的梦,我接着就听到了她绿色的歌声。(常荣《背影》)

以上“一量名”修辞构例中,“量”分别是构件名词的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容器角色,这三种角色的“量”一般都是借用自名词的临时量词。^⑥例(3)“一瀑秀发”中使用“瀑”作为临时量词,描写的是“秀发”如瀑布般亮直的特征。当量词是名词的形式角色时,可以用“N如M”(秀发如瀑布)、“M状的N”(瀑布状的秀发)、“M似的N(瀑布似的秀发)”等结构来测试(M指量词)。例(4)“一躯斜卧于秋野之上的睡美人”使用“躯”作为临时量词来修饰名词“睡美人”,凸显睡美人的修长体态。当量词是名词的构成角色时,可以用“N的M”(如“睡美人的身躯”)来测试。例(5)基于上文“绿色的小舟”表达,用具体的、有形的物体“船”来量化抽象的“梦”,使“梦”具象化。当量词是名词的容器角色时,可以在中间加“的”,如“一船的梦”“一脸的水”“一手的泥”;也可以用“有”字结构来测试,如“船里有梦”(此例中有隐喻)“脸上有水”“手上有泥”。

上面三个构例生成的基础和前提是“量”“名”之间的物性关系,不同的语义关系凸显出修辞构例不同的语义语用特征和表达效果,它们分别凸显了名词语义体系中的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和容器角色。而下面两例中,为了凸显“一量名”构式中名词的动态性,借用动词作为临时量词,“量”是“名”的行为角色和处置角色。例如:

^⑤物性结构体系提供了一种描写名词语义网络体系的技术和方法,本文基于自然语料和内省语料,只重点介绍了袁毓林(2013)体系中的五种物性角色并做了局部调整,这并不是说另外五种物性角色不存在了,只是在“一量名”构式中,名词语义网络中所凸显的要素一般是形式、容器(属于该体系的单位角色)、构成、行为、处置等,凸显何种角色本质上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中的丰富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的认知因素(第五节将说明为什么容易凸显这几种角色),涉及如何将认知上凸显的信息概念化、语义结构化。另外,袁毓林(2013)将名词所指事物的计量单位都归为“单位角色”,这对我们考察修辞构式“一量名”中量名之间深层次的语义关系并不完全适用,我们将其单位角色中特指容器的量词抽取出来单独命名为容器角色,其他单位角色根据量、名之间的语义关系归入到其他四种角色。至于评价角色,大体来看有两类评价,一类是基于对象外在属性特征而做的评价(如“一弯月亮”),另一类是基于对象内涵特征而做的评价(如“月亮”的评价“温柔、动人、苍凉、幽静”等)。经分析语料发现,出现在“一量名”构式的评价角色多是凸显名词的形状、颜色等外在形式特征,因此我们一并将其归到形式角色中。

^⑥“一量名”构式中,有少量形式角色来源于形容词。如例(2c)“一圆黑洞”中,“圆”凸显的就是“黑洞”的外在形状,属于形式角色。

(6)这样又是一段路过去了,横在面前的是一蹲广平的大石头。(萧军《八月的乡村》)

(7)沙发几上供着一插康乃馨,窗外盛开着满树芙蓉。(谷应《困惑》)

例(6)“一蹲广平的大石头”,“蹲踞”是名词“大石头”的行为角色。直接移用“蹲”作为量词修饰“大石头”,可以凸显其横踞人前的动态性。当“量”是名词的行为角色时,可变换成主谓结构如“大石头蹲踞在面前”(从构例生成的可能性来讲,语言使用者也可产出“一踞大石头”)。例(7)“一插康乃馨”,“插”是名词“康乃馨”的处置角色,在典型事件场景中,(瓶中的)“鲜花”能激活的常见行为动作就是“插”。当“量”是名词的处置角色时,可变换成动宾结构如“插花”。

通过对构件“量”与名词之间物性关系的描写,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非常规组合的语义条件限制、语义关系类型和修辞构例生成的语义基础。尤其是对于“一量_{移用}名”构式来说(如例(3)–(7)),构件“量”与名词之间的物性关系清楚明显,语言使用者都是直接移用其他词类的词作为“量”来凸显名词的相关物性角色,这种创新使得“量”与“名”之间的语义理据性更加显性化,其带来的特殊修辞效果也更容易获得受众注意。

而在“一量_{错位}名”构式中,因量词是专用型量词或兼类量词,该类量词往往和特定名词具有强制性的、规约性的选择关系,母语使用者往往不需要在线进行特别的心理操作就能即时提取投入使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两个构件之间的语义理据性变得模糊。例如:

(8)一只男人(小说名称)

表面上看,“一只男人”的生成语义基础如何并不明确,这本质上与该构例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相关。从生成视角来看,语言使用者先在“男人”和“狗”等走兽之间建立了隐喻联系,进而将“狗”的搭配量词与“男人”形成错位搭配。但进一步分析,“只”与“狗”等走兽的语义关系仍然不是很鲜明,这就是由于“只”的高频使用,使它的搭配用法已固化在语法系统中,其与搭配名词之间的语义理据性已逐渐弱化。若要考察“只”和“狗”等的物性关系,最终需要追溯到“只”的本义及其如何发展出量词的用法。“只”的本义是一只鸟,由此发展成“鸟”的量词,是“鸟”的构成角色,后其搭配对象逐渐由飞禽扩展到走兽等(如“一只狗、一只猫”)。而此处用“只”来修饰“男人”是为了表达作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像狗一样晃晃荡荡、没有方向。

因而,对于“一量_{错位}名”构式,因其“量”的规约性用法,语言使用者并不需要再进行如此复杂的心理操作来分析其与搭配名词之间的物性关系如何(但需要进行别的认知操作而使量名之间的组合变得合用,请见下文分析)。但若探本溯源,这两个构件的语义联系一定存在某种理据性。这也说明,我们仍然可通过描写名词的物性结构,对这两类子构式的生成基础做出一致性的说明。只是由于其生成路径和生成机制的差异,形成了两类不同的子构式,有的是错位使用,有的是创新移用。

三 “一量名”构式的生成过程

在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过程中,一方面受到语法构式对构件的框定作用,具有框架依赖性(frame dependency),语法构式“数量名”为修辞构式“一量名”提供了一个语法框架和背景性意义、功能,框定了构件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基础性语义要求,对能够进入的构件进行了一定的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在特定的语境中,语言使用者可以调变构件与构件之间的关系,打破语义条件限制,在线性序列上实现为超常组合关系,当调变事件不断地重复发生,便有可能影响构式形义匹配关系的变化,从而概括出新的图式性修辞构式。整个过程存在构体对构件的“招聘”和构件向构体“求职”的双向合力互动机制(参见施春宏 2014)。

语法构式“数量名”有三个构件,其结构层次是“[数量]+名”,数量短语和名词是直接组合关系。说话人可以通过调变“数量”(主要是“量”)或者调变“名”来实现创新使用。但从形式上来讲,该结构是以名词为核心的向心结构,因而构式的生成视角(说话人的视角)是以名词为中心来激活相关形式结构和语义网络,通过不同的生成路径和机制来凸显相关语义特征、表达某种特殊功能,而在线性序列上都呈现为调变构件“量”。例如:

(9)雪地里立着一株少女,水仙花似的。(邢奎《问路》)

(10)从这扇半翕半开的木窗望去,天上还有一梳月牙。(戴领《无尽的草草》)

例(9)“一株少女”是“一量_{错位}名”的修辞构例,“株”和“少女”是错位搭配,从识解的角度来看,既可以说调变“量”,也可以说调变的是“名”。但从构式生成角度来看,语言使用者想表达的语义起点是“少女”,该构例承继的宏观语法构式(macro-construction)是“数量名”,中观语法构式(meso-construction)是“数+X+少女”,而非“数+株+X”,该例调变的仍然是构件“量”。“量”是听话人的识解焦点。

例(10)“一梳月牙”是“一量_{移用}名”的修辞构例,调变的是量词(因为“梳”一般不做量词使用),“量”凸显出构式语义核心和表达意图。语言使用者为了凸显月牙弯弯的形状,从构式库中搜寻与月牙相同形状的名词,最终选择了“梳”作为临时量词,形成“一梳月牙”这种表达。

基于以上关于修辞构式生成的认识,我们将“一量名”构式的生成过程描述为:

A. 汉语语法系统中存在语法构式“数量名”,对名词进行计数和分类。其中量词(物量词)和名词之间存在规约性的搭配关系。→

B. 提取“数量名”语法构式用于充当宾语、主语等。→

C. 语言使用者根据特殊的修辞表达需求,在构件名词的语义体系中凸显某种物性角色,而构式库中没有适切的量词来承担名词的这种物性角色,进而依托于“数量名”语法构式的型式框架和功能,调变构件“量”来实现特定功能。→

D. 受特定语境因素促动,在线实现量、名的错位组合(“一量_{错位}名”)或者移用适切新异的量词(“一量_{移用}名”),创造出“一量名”修辞构例投入交际使用。→

E. 不同“一量名”修辞构例的结构化重复使用,抽象化成宏观构式“一量名”。

可以看出,这类修辞构式的生成过程路径鲜明,依托于语法构式^⑦,充分调动百科知识、上下文语境等,发挥人类认知机制的作用,调变语法构式,实现创新使用。例如:

(11)思慧的表情仍然那么恬淡平静,嘴角隐隐约约还似孕育着一朵微笑。(亦舒《迷迭香》)

(12)刚洒过一泼“跑山雨”,虽嫌毛毛躁躁,却是把灼灼逼人的暑热给杀乖了点。(万国智《神泉》)

例中,“一朵微笑”和“一泼‘跑山雨’”承继了构式库中“数量名”这个型式框架,也承继了其语法功能,作“孕育”“洒过”的宾语。例(11)中,语言使用者根据表达需要,要凸显名词“微笑”像花朵一样这个形式角色,而与“微笑”具有规约性搭配关系的量词“丝”“个”等显然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借助储存在大脑中的百科知识在“微笑”和“花朵”之间建立隐喻联系,“鲜花”就

^⑦有的修辞构式的形成并不依托于语法构式的型式框架,如施春宏(2017)中分析的“变零构式”,包括增零构式(如“这是一万零一年的一个石斧,价值二十万国魂”)和减零构式(如“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语法构式和修辞构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给“微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概念结构,使“微笑”与“朵”之间形成错位搭配。当这种基于“数量名”构式的调变事件重复出现、高频使用,就能图式化成“一量_{错位}名”构式。

同样,例(12)中,语言使用者根据表达需要想要凸显“跑山雨”的动态性(可以是行为角色、处置角色),刻画“跑山雨”一阵一阵的倾盆之势。由于“雨”现有的搭配量词“场”“阵”“滴”等都无法满足这种表达需求,于是根据“雨”的语义体系来寻找合适的词与“雨”组合。“雨”的行为角色有“倾”“泻”,其处置角色有“泼洒”“倒”等,根据上下文语境,前文出现了动词“洒”,因而最终选用“泼”形成“一泼‘跑山雨’”投入交际使用。当然“一泻雨”“一倾雨”等也有在线生成的可能性,但现实交际最终选择什么量词,与语境因素相关,这也说明修辞构式的生成往往依赖语境结构(situational structure)(参见施春宏、李聪 2018)。

“一量名”修辞构例在语言使用中出现,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语法系统中的语法构式无法满足实际使用中的功能需求,语言使用者只能通过各种创新调变来生成合乎语用的表达,从而在使用中丰富了语言交际的方式,逐渐形成了具有抽象图式的修辞构式。

四 “一量名”构式的生成机制

前文提及,“一量名”构式的生成过程,真正从生成而非识解的视角来看,最终调变的都是构件“量”,由此来实现构式的特殊表达效果。虽然结果都是调变“量”,但修辞构式“一量名”的两个子构式的调整策略及其生成机制有所不同。下面分别讨论。

4.1 “一量_{错位}名”构式的隐喻生成机制

修辞构式“一量_{错位}名”的生成,依托于语法构式“数量名”,语言使用者通过隐喻机制在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和另外一种事物之间建立了拓扑关系,不仅转移了该事物(名词)概念的内在属性,而且转移了整个认知模型的结构、内部关系或逻辑(Ungerer & Schmid 2006/2009: 131),两个名词因此而进行了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⑧。例如:

(13)从窗缝漏进一滴月光,洗亮你的眼睛。(傅天琳《晨》)

结合上下文语境(如“洗亮”),语言使用者想凸显月光如水般澄澈透明,在“月光”和“水”之间建立了映射关系,并通过概念整合生成了“一滴月光”这个修辞构例。概念整合涉及四个心理空间,这两个名词,分别代表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这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有各自的语义体系。而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有两个输入空间中的共同抽象结构,将“月光”的纯洁明净与“水”的透明澄澈对应连接起来。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地将部分要素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blend space),在这个空间中会产生其他三个空间没有的新显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将本来属于“水”这个语义体系中的构成角色“滴”与“月光”组合搭配,形成修辞构例,在凸显特殊修辞表达功能的同时,减弱了原来语法构式“数量名”表示数量多少的意义。

4.2 “一量_{移用}名”构式的转喻生成机制

修辞构式“一量_{移用}名”的生成,同样依托于语法构式“数量名”,但生成的认知机制不同。在生成“一量_{移用}名”构式时,语言使用者主要发挥转喻机制的作用来凸显名词语义体系中的某种物性角色,根据语义一致性原则,构件“量”最好能体现出构件名词的语义倾向性,但是在汉语系统中没有可供直接使用的量词来满足这种组合条件,因而通过调变“量”来承载凸显的物性角色的功能,直接与名词在线组合。“一量_{移用}名”构式中,当要凸显名词的形式角色时,就将

^⑧有关概念整合理论参看 Fauconnier & Turner (1996), Fauconnier (1997), 王文斌、毛智慧(2011)。

充当形式角色的名词移用为“量”。例如：

(14)整个的城市暗了下来,低低的卧在她脚头,是烟铺旁边一带远山……(张爱玲《怨女》)

例(14)中“远山”的语义体系中包含丰富的内容,如其形式角色“(远山如)线、眉、浪、带”等等,构成角色“树林、花、草”等,行为角色“绵延、显现”等,处置角色“看见、眺望、观赏”等。而语言使用者意在凸显其绵延曲折的形式角色,就通过发挥转喻机制将这种形式角色凸显出来,而隐去其他物性角色等相关内容。根据“远山”的形式角色,有多种可能性表达如“一线远山”“一浪远山”“一眉远山”“一带远山”,具体实现哪一个表达有赖于具体使用场景的激活。

“一量_{移用}名”构式中,当语言使用者要凸显名词的构成角色、行为角色时,就直接将其构成角色移用为“量”。例如：

(15)细雨一犁春意,西风万宝生涯。(张炎《风入松·赋稼村》)

(16)黑色孵着一流徐缓的小溪,和水里映衬的惨淡的云霞。(焦菊隐《夜叉》)

例(15)在“农耕时期的春天”这个认知场景里,“春意”的构成角色有“犁”“锄”“草”“梨花”等多种意象,可以生成很多种可能性表达如“一犁/锄/草/梨/藤春意”等。其中,农民耕田是“春天”整个认知场景中较为凸显的事件,文人创作时,耕田这个意象往往是入诗入画的。而且,在下文中出现了“却笑牧童遥指”这一词句,“犁”与“牧童”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因而词人选用了构成角色“犁”形成“一犁春意”这个表达。^⑨ 例(16)“一流徐缓的小溪”凸显的是“小溪”的行为角色“流”。“小溪”语义信息丰富,如包含形式角色(条、股、脉等)、行为角色(奔流、流淌等)。语言使用者发挥转喻机制,有意潜隐“小溪”的部分行为角色和其他物性角色,凸显其“流动”“流淌”的行为角色,而语法系统中没有合适的量词来承担这种功能,从而调变构件“量”直接使用“流”作为“量”。

4.3 隐转喻互动机制

前文我们就两类子构式的生成机制隐喻和转喻分别做了说明,其实这两种机制常常相互作用,“交汇于概念以及语言的十字路口”(Barcelona 2000)。Goossens(1990)将两种机制的互动称为隐转喻(metaphonymy)现象,并提出两种常见的隐转喻互动关系:来自转喻的隐喻和隐喻内包含转喻。

先来看第一种隐转喻互动情况:来自转喻的隐喻。Goossens认为,“相似性”的概念是建立在两个事物通常在同一认知域中处于邻近关系这个基础上。例如:

(17)时刻到了!让我们仰望每一架苍鹰,每一匹雪山。(刘川《在清晨朗诵》)

语言使用者基于相似性在“苍鹰”和“飞机”之间建立了映射关系。而这种相似性能够激活的前提是“苍鹰”和“飞机”都处于语言使用者的某一认知域,具备邻近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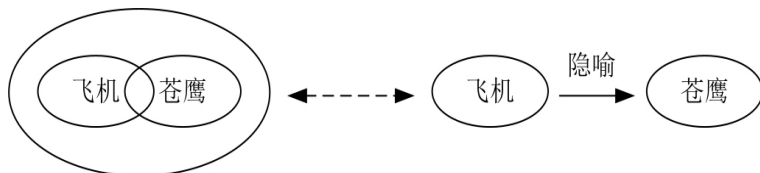


图1 “一架苍鹰”中来自转喻的隐喻^⑩

^⑨ 匿名审稿专家启发我们对该修辞构例生成的制约因素做出进一步说明,谨此致谢。

^⑩ 图1左侧两个本来离散的认识域相交了,它们融合在一个场景中。图的右侧两个认识域是分离的,但如虚线箭头所示,这与左侧的两个认识域相交的场景存在概念性连接。

再来看看隐喻内包含转喻的构例：

(18)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苏轼《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例(18)“一叶白头翁”中，“叶”在现代汉语系统中没有量词的用法，但其历史上有用来计量“船”等叶状事物的量词用法。“叶”的这种量词用法根本上是基于“叶”和名词(如此处“船”)之间的相似性，是隐喻机制在发挥作用。该构例的隐喻中还存在一层转喻，即用船上的“白头翁”来指代“船”。具体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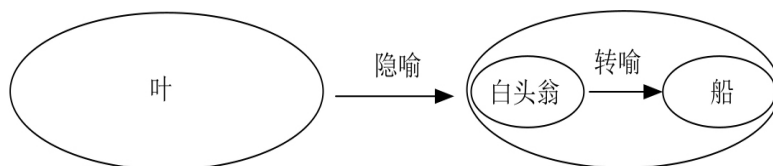


图2 “一叶白头翁”中隐喻内含转喻

修辞构式“一量名”，在语法构式“数量名”的框架下，对构件与构件之间的关系采取不同的调变策略，对“名词”进行隐喻引申和转喻凸显，最终调变构件“量”，从而形成两类不同的子构式，实现构式能产性的拓展。而能产性问题本质上就是下节所探讨的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

五 修辞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名词物性结构的分析与“一量名”构式生成过程和机制的刻画，使我们对修辞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下面结合“一量名”构式生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来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基础从内部(根本的)原因来说是量词和名词的语义结构之间存在认知理据上的关联，从外部原因来说是语境的促发作用。一个名词有多种物性角色，而每一种物性角色中也有多种可能表达形式，在实际交际过程中生成何种表达依赖于现实化的制约条件和交际目的。下面就以“夕阳”为例来说明。

为了尽量呈现出汉语使用者使用“夕阳”的真实情况，本文基于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中的实际用例来归纳描写“夕阳”的物性结构。名词跟不同的物性角色搭配会产生不同的句法格式，考察归纳名词在句法中的搭配可以描写出该名词的物性角色。形式角色往往没有特定的句法格式，但在“一量名”中可根据名词外在属性特征的相似性生成修辞构例，因而我们使用“夕阳像/似/如/好像/好似 n”等格式来归纳夕阳的形式角色，前文也提到本文将评价角色(都为描写外在形式特征的)也并入到形式角色中，而评价角色一般由形容词构成，因此也采用“a(的)夕阳”“夕阳 a”格式来检索；构成角色采用“夕阳的 n”格式；夕阳的容器角色一般是用夕阳可依附、可容纳的物体来充当，因而采用“n(中/上/里)的夕阳”的格式；处置角色是采用“v 夕阳”的格式；采用“夕阳 v”的格式检索归纳其行为角色。(符号 n、v、a 分别代表名词、动词、形容词)现将夕阳的物性结构体系描写如下①：

夕阳：名词，指傍晚的太阳。

形式角色：火、血；胭脂、火球/红球、饼、圆盘、珍珠；残……

①此处仍是围绕“一量名”构式来描写“夕阳”的部分物性角色。若不考虑该构式，放在整个词库中来看，“夕阳”也具备评价角色(描写内涵特征的)、施为角色等其他五种物性角色。

构成角色:余晖(辉)、光、紫外线、红外线、可见光……

容器角色:大地、河堤、山包、脸庞、大海、江河……

行为角色:照耀、映照、落下、透过、下山、挂、染、垂、铺……

处置角色:看(到)、观赏、望、凝视、划破、送、背着……

可以看出,“夕阳”有多种物性角色,每种物性角色下也有多种选择,这就说明“夕阳”组成的“一量名”修辞构例会有多种可能性。拿形式角色来说,根据上文对生成机制的说明,这种可能性大致有两种生成路径。一是启动隐喻机制,基于相似性将“火、血、球、珍珠、圆盘”等的语义结构与“夕阳”建立映射联系。例如根据“珍珠”,我们就可以生成“一粒夕阳”“一颗夕阳”等错位型修辞构例。二是直接运转转喻机制,将“夕阳”语义体系中的形式角色凸显出来,并在句法上与该物性角色直接组配。经具体语境因素的激活凸显形式角色,例如“一残夕阳”“一火夕阳”“一血夕阳”“一珠夕阳”“?一盘夕阳”“?一球夕阳”“?一饼夕阳”^⑩等移用型修辞构例。“夕阳”的形式角色有多种选择,而这些形式角色充当“量”的可能性程度不同,受到语言使用者百科知识(“夕阳”和这些形式角色建立映射关系的难易)、审美需求和语境激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通过发挥转喻机制的作用,直接用“夕阳”转指“夕阳光”,将“夕阳光”的形式角色量词直接与“夕阳”搭配,可实现生成“一束夕阳”“一柱夕阳”“一线夕阳”等错位型修辞构例。例如:

(19)西南方,一束夕阳斜射进两座山梁间,好似从虚掩的门缝里透过来的一条明晃晃的光带。(邵钧林、黄国荣、郑方南《沙场点兵》)

(20)院落里竹林、假山、小溪、花园,景色清幽,令人心旷神怡。窗口投下一柱夕阳。照在榻上。(萧舒《金庸世界里的道士》)

上面是对形式角色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说明。至于构成角色,“夕阳”的构成角色都是指夕阳的光,启动转喻机制,直接将其构成角色与“夕阳”在句法上搭配,可形成“一晖夕阳”“?一光夕阳”等表达。与“一光夕阳”相较,“一晖夕阳”生成的可能性更大,是由于“晖”专指“太阳之光”,从认知上来讲,“晖”与“夕阳”能够快速相互激活。

容器角色作为“量”生成现实表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凡是具备依附性或者容量性的名词都可能满足该语义条件作为“夕阳”的容器量词。例如“一地夕阳”“一山夕阳”“一江夕阳”“一脸夕阳”“一窗夕阳”“一帘夕阳”“一轩夕阳”“一廊夕阳”等。“夕阳”的容器角色基本上都可以生成合适的构例。

至于行为角色尤其是视觉上容易感知的行为动作和外在特征,实现相关构例的可能性也较大。如“一挂夕阳”(见例(21))。“一垂夕阳”“一落夕阳”“一染夕阳”“一铺夕阳”等虽在语料库中没找到相关构例,但只要有现实条件的触发,就有生成的可能,见例(22)。

(21)汉末魏晋六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有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心态/一声牛哞 一缕炊烟/阳光灵动 古树婆娑/一座茅屋一挂夕阳……(王新平《三宝传奇盛世之歌》)

(22)一垂夕阳悬在天与海的边缘。(自拟)

^⑩类似于“一盘夕阳”“一球夕阳”等表达在现实中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现,只是因不符合惯常审美需求而不宜出现。但在某种特殊语境下,也有生成的可能。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人好久没有吃饭,饿得眼冒金星,看一切东西都像佳肴,这时候抬头看向夕阳,生出“那天边挂着一盘夕阳”也无不可。

而处置角色,“*一看夕阳”“*一望夕阳”“*一送夕阳”“*一背夕阳”生成可能性较低。人为的力量不可能真正地对夕阳进行处置,所以“夕阳”的处置角色“看”“望”“送”“背”从一般认知心理上讲不能够快速激活“夕阳”,这也会导致该构例可接受度不是很高,不符合一般审美认知。

由上可知,不同的物性角色生成“一量名”的可能性程度不同。首先,名词性物性角色出现在槽位“量”,生成现实表达的可能性较之谓词性物性角色要高。这是因为修辞构式“一量名”承继了特定语法构式的一些句法特征。在“数量名”结构中,物量词一般说来都是由普通名词演变而来,它们作为量词的意义以及和名词之间的搭配关系都是由其本义引申而来(参见王力1958/2012:279),因此很多量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名词所具有的物性角色。如量词“条”,其本义是“小枝”,发展成量词用来修饰像树枝般长条形的物体。形式角色、容器角色和构成角色等从词类来看一般由名词充当,因此相较于行为角色等谓词性角色,调变构件“量”由这三类名词性物性角色充当并生成相关构例的可能性更高。

在这三种名词性物性角色中,量词为形式角色的生成的可能性很高。因为有关事物的形式特征是最能够直接投射到人的大脑中,事物形式上的相似性也最容易建立起隐喻性的联系。^⑬量词为容器角色生成的可能性也很高,例如“夕阳”的容器角色基本上都可以直接与“夕阳”组配,名词只要具有可容性和可依附性都可移用做“量”。总的来说,形式角色和容器角色相较于构成角色、行为角色和处置角色,生成“一量名”修辞构例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在每一类物性角色内部,其成员生成“一量名”的可能性程度也不同,这受到认知理据、百科知识、语境激活、语用功能、审美需求等多种因素交错影响。^⑭

经过上文对名词以及量词的物性角色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辞构式实例化有着怎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高低由什么因素制约;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时,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现实表达的可接受度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要认识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对构件的形式意义特征、构件与构件之间的组合关系、构件和构体的融合程度(即求职和招聘的互动关系)做出精致的还原分析,在还原出成分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再整合出合适的构式表达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强化我们对“超常”搭配的“常规”路径分析,进而使修辞方式和修辞效果的研究更具有可操作性,这样就必然会使修辞研究呈现出“语法”化的面貌,有效提高对修辞表达方式的预测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使语法研究和修辞研究从结合的研究走向真正互动的发展(施春宏2012)。

六 余论

修辞构式的生成与扩展是多重因素互动作用下的结果,既要考虑构体与构件的互动,也要考虑构件与构件之间的互动,构式(包括构体与构件)与外部因素如语境的互动,语法和修辞的互动等。因而,修辞构式的研究要以“互动”为基本立足点和最终研究目标,力求使修辞构式的形义关系分析变得有脉可循,这也是“互动构式语法”的初衷和理念。(参见施春宏2016)具有

^⑬这也得到了历时研究的证明。李先银(2009)研究发现,在长期的个体量词生产过程中,提取形状特征的量词生产机制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

^⑭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意见。“一量名”构式中,不同物性角色和相同物性角色内部成员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需要数据支撑,有关数据统计及其影响因素等将另文专述。

语法—修辞界面特征的修辞构式如何在互动的观念下展开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就本文基本研究思路而言,修辞构式的研究绝不是简单地将构式语法理论套用在修辞研究中,而是提倡修辞构式研究也要有“法则”的意识和“立法”的追求。修辞构式的生成基础、生成过程、生成机制其实皆有路径可依。例如若修辞构式依托于特定的语法构式,那么形成初期一定是在语法构式的框架下进行调变,而这种“调变”基础一定得还原到构件特征、构件与构件之间关系特征的分析,“调变”过程必然合乎一般人类认知基础和加工限制,“调变”结果最终也会显现在线性序列上。而修辞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体现和蕴含在整个“调变”的基础、过程和机制之中。

整体而言,语法研究侧重于语言单位的分布特征和结构规则,修辞研究侧重于语言手段的运用方式和表达效果。修辞构式本质上既具有构式性,又包含修辞性,修辞构式可作为沟通修辞研究和语法研究的桥梁,基于构式语法的理论路径来研究动态语言现象,考察动态语言现象背后蕴藏着的一般规律和认知机制,使得语法研究和修辞研究真正走向一条互动互进之路。

参考文献

- 冯广艺、张春泉 2002 数量短语的变异运用,《修辞学习》第 1 期。
- 高原 2009 古典诗歌中“数量名”结构概念合成的绘画美,《修辞学习》第 6 期。
- 侯国金 2016 评“语法构式、修辞构式”二分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 雷淑娟 2005 由数量词词义偏离看文学语言的模糊美,《修辞学习》第 3 期。
- 李先银 2009 汉语个体量词产生过程构拟,[韩国]《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第 21 辑。
- 刘大为 2010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下),《当代修辞学》第 3、4 期。
- 毛智慧 2008 英汉表量结构中物量词的隐喻构建机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 1 期。
- 毛智慧、王文斌 2012 汉英名量异常搭配中隐喻性量词的再范畴化认知分析,《外国语文》第 6 期。
- 施春宏 2012 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当代修辞学》第 1 期。
- 施春宏 2014 “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当代修辞学》第 2 期。
- 施春宏 2016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当代修辞学》第 2 期。
- 施春宏 2017 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及相关问题——以变零构式为例,《当代修辞学》第 3 期。
- 施春宏 2018 《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互动构式语法探索》,商务印书馆。
- 施春宏 2019 句式意义分析的观念、路径和原则——以“把”字句为例,《汉语学报》第 1 期。
- 施春宏、李聪 2018 “来+NP”的构式特征及其能产性,《当代修辞学》第 6 期。
-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 王文斌、毛智慧 2009 汉英表量结构中异常搭配的隐喻构建机制,《外国语文》第 3 期。
- 王文斌、毛智慧主编 2011 《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希杰 1990 论潜量词的显量词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
- 王寅 2011 《构式语法研究(上卷):理论思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袁毓林 2013 基于生成词库论和论元结构理论的语义知识体系研究,《中文信息学报》第 6 期。
- Barcelona, Antonio 2000 Introduction: 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Antonio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1—2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Fauconnier, Gilles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1996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 In Adele E. Goldberg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and Language*, 113—131.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Goossens, Louis 1990 Metaph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323–342.
- Kay Paul & Charles J. Fillmore 1999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Language* 75(1): 1–33.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Ungerer, Friedrich & Hans-Jörg Sch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彭利贞、许国萍、赵薇译《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

The generative basis and mechanism of the rhetoric construction “yi+Cl+N”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of the generation of rhetoric construction

Qiu Ying and Shi Chun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s of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enerative basis and mechanism of the rhetoric construction “yi (一)+Cl+N”. With the description system of qualia structure, it first analyzes the relations of semantic dependency between two construction components (CL and N) to explain the generative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Then the generativ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yi + Cl + N” is illustrated from a two-way joint perspective “recruitment” (construction body to components) and “application” (components to construction body). It then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two sub-constructions “yi + Cl_{misplaced} + N” and “yi + Cl_{trans-used} + N”.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of the generation of rhetoric construction.

Keywords rhetoric constructio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yi+Cl+N; qualia structure; generative mechanism;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邱莹 330022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施春宏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语言科学院)

(责任编辑 李先银)

第一届语言习得、认知与脑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CLCB-1) 通知(第1号)

第一届语言习得、认知与脑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20年6月13–14日在北京举行,由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中心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现向海内外专家和学者公开征集会议论文摘要,摘要截止日期:2020年3月1日。

详细信息敬请访问以下网站: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认知科学学科创新引智中心:<http://ccsl.blcu.edu.cn>(中文),<http://encsl.blcu.edu.cn>(英文);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http://yuyanzyuan.blcu.edu.cn>。